

西方平台城市主义的兴起及对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影响

The Rise of Platform Urbanism in the West and Impacts on the Future C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孔宇 甄峰 张姗姗 魏玺

KONG Yu, ZHEN Feng, ZHANG Shanqi, WEI Xi

摘要：城市平台正改变着城市运作和居民体验城市的方式。平台化的城市空间重构和居民生活重塑引起了学界关注，而平台城市主义这场以城市平台为中心的运动也被学者用来定义和理解平台对城市各要素的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研究中的平台城市主义概念，明确其结合新兴技术以调节、优化和配置城市不同要素来重塑城市的内涵，并进一步指出其以数据为核心、依托城市空间、以市场或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特征。基于此，笔者进一步从城市空间、城市居民和城市治理三方面，对平台城市主义背景下的中国未来城市发展进行思考，以期为中国未来城市规划与建设提供参考。

Abstract: Urban platforms are changing the way cities operate and residents experience cities. Platform-based urban spa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sidents' lives have attracted academics' attentions. Platform urbanism, a movement centered on urban platforms, has also been used by scholars to define and understand the impacts of the platform on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city. By sorting out existing research relating to the concepts of platform urbanism, this paper clarifies its connotation as the integr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to regulate, optimize and reconfigure various urban elements, thereby reshaping the city. It further highlights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platform urbanism as being data-centered, spatially embedded, and oriented toward the market or consumers' demand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future c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latform urbanism from three aspects of urban space, urban residents and urban governance, intending to support China's future c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关键词：平台；平台城市主义；未来城市；智慧城市；城市空间；城市居民；城市治理

Keywords: Platform; Platform Urbanism; Future City; Smart City; Urban Space; Urban Resident; Urban Governance

引言

随着各类城市平台的出现与崛起，中国的数字增强型城市建设得以快速发展，平台也逐渐成为体验、调节和治理城市的重要方式^[1]，支付、共享、商业零售等各种数字平台提供的服务迅速渗透进居民的日常生活。截至2025年6月，中国网络社交、网络支付、网络购物、外卖等平台用户规模分别达到11.07亿、10.22亿、9.76亿和5.69亿^①。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平台服务已经嵌入城市空间，并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而城市平台也在重塑城市物质空间和居民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3]。面对平台这一供给模式对城市的影响^[4-6]，平台在城市建设与运行中所展现出的力量和作用引起西方城市规划和地理学者们的关注，“平台城市主义”（Platform Urbanism）这一新概念也被用来命名这场正在进行的、以平台建设为核心的城市运动^[7]。

自2011年起，中国的智慧城市试点、建设标准和评价体系等内容陆续推出，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逐渐关注并转向数字化增强的开发模式^[8]，通过城市智能规划提升城市智能水平也成为热点内容^[9]，并吸引了科技企业实验和开发智慧城市项目^[10]。但相较智慧城市通过政府向技术公司或研究机构采购各类系统来解决城市问题，提升对城市建设和运营监管的效率^[11]，平台则是“资本—技术—城市”的不同组合，运营与居民日常生活、工作、出行、消费等不同方面相关的服务^[7]，更直接地连接居民，并保持与居民间的持续互动^[6,12]。因此，平台已不只是一种资本或技术的体现，更是一种城市现象——城市正逐渐被各种类型的平台重塑。

作者：孔宇，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省智慧城市规划与数字治理工程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kongyu@smail.nju.edu.cn

甄峰（通信作者），博士，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省智慧城市规划与数字治理工程研究中心，教授。zhenfeng@nju.edu.cn

张姗姗，博士，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省智慧城市规划与数字治理工程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魏玺，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省智慧城市规划与数字治理工程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① 详见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于2025年7月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面对平台对城市空间和居民活动的影响,西方学者已就平台城市主义展开一定讨论,城市政府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由平台引起的运动正在挑战其理解和规划城市的方式^[13],但整体来讲,国内对这一城市发展新模式关注较少。随着各类城市平台逐渐成为城市数字化增强发展的重要途径^[1],有必要通过对平台城市主义的解读,分析其对中国未来城市规划建设的可能影响。基于此,笔者首先对西方提出的“平台”“平台城市主义”概念进行概括和解读,并总结平台城市主义的内涵和特征;在此基础上,从城市空间、城市居民和城市治理三方面思考平台城市主义对我国未来城市建设的影响,以期为中国未来城市的数字化增强规划和发展提供参考。

1 平台与平台城市主义

平台作为技术发展的产物,已经深入城市的各个方面,包括城市的空间组织、居民日常生活和城市治理等。虽然西方学者已开始关注到平台对城市重塑的作用,开展了关于平台城市主义的研究,但因研究历程相对较短,平台城市主义的概念及其对城市的影响仍处于讨论阶段。

1.1 平台与平台城市主义的概念

平台泛指新兴技术所构成的集合,其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相适应,逐渐产生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实践和商业模式^[14]。它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基础,通过汇集数据和相关资源,吸引城市居民、政府、企业等进行线上交易等各种互动,进而为不同主体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平台包括社交媒体、商业零售、支付平台等不同类型^[1],且不同平台间可能存在相互联系,例如地图导航平台为共享出行平台提供地图导航服务。对于城市而言,平台与城市基础设施有一定相似之处,技术发展产生的平台正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平台化”以及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平台与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15],平台的作用和价值在城市中逐渐凸显。巴恩斯(Sarah Barns)在2014年提出了“平台城市主义”这一概念,用以强调城市开放数据平台、城市数字发展战略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作用^①。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平台的基础设施性质^[16],平台城市主义也逐渐引发学者们的讨论,为研究平台在城市中的影响和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14]。

(1) 技术视角

平台城市主义被认为是由技术集合而成的数字化城市发展模式,涉及不同类型的平台组合,并将数据视为城市管理

的关键资源,以实现平台与城市的有效联系为目标^[11]。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可被理解作为一种多边数字媒介,联系起技术公司、服务供应商、用户等不同主体,重新构建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角色^[17]。但不同于简单的数字媒介作用,平台还可以通过算法组织的数字活动支持城市社会、经济、政治等不同方面的运转^[11,16],并重新配置各类与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相关的数据基础设施,改变居民、产品、信息等要素的流动^[16,18],影响城市治理的方式^[3]。

(2) 资本视角

平台不仅是一种技术中介,其本身更是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平台经济通过提供软件程序、应用程序接口等,促进不同用户群体之间的交互和联系^[19],并从用户处提取数据加以利用,实现资本的流通和积累^[20]。这一商业模式不仅渗透并影响着既有市场,而且通过开发新的市场重塑了消费实践^[21]。其中,快速发展的共享经济作为平台经济的一个特定领域,受益于平台经济的数字化设施,可以将供需双方聚集起来形成网络效应^[22]。例如优步(Uber)等共享出行平台可以将有拼车需求的乘客与愿意提供拼车服务的司机联系起来,并向乘客与司机用户双边收取费用,同时获取两方的数据,并于后续创造经济价值^[19]。因此,从资本的视角看,平台发展的关键在于成为消费者、生产者和其他相关参与者之间的中介,其发展规模取决于资本化的潜力^[12]。在这一过程中,平台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关键,集合不同技术的各类平台则逐渐被空间化^[14]。平台的发展呈现依赖城市特定环境特征以实现社会关系调节和经济价值获取的特点^[7],其商业模式根植于城市社会经济和空间的不同方面^[11];城市则为平台的发展提供试验场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支撑。

(3) 智慧城市视角

平台城市主义被认为是智慧城市发展模式的延伸。虽然平台城市主义与智慧城市均以数据为核心,通过技术和城市基础设施实现高效的城市治理,维持各类社会经济活动,但是相较于智慧城市利用大数据和网络技术形成的各类传感器和控制室^[23],平台城市主义通过个体终端网络设备更直接地与居民产生联系^[14,16],并产生与对应服务相关的各类平台实体以及与之相关的本地化物质(如外卖平台与送餐车辆),同时提供的服务大多与城市日常生活密切相关^[3,24]。

总体来看,平台城市主义是平台重塑城市的方式,它是一种以数据为核心,以集成新兴社会技术和算法为媒介,推动城市空间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空间资本的不断积累,优化居民日常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城市治理的城市发展模式(图1)。

① 详见巴恩斯于2014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办的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Annual Meeting)年会上做的题为“Platform Urbanism: the Emergent Politics of Open Data for Urban Management”的报告。

1.2 平台城市主义的内涵和特征

1.2.1 平台城市主义的内涵

平台城市主义将城市视作一个包括平台、居民和城市物质要素的动态综合体^[14]，而平台本身作为技术进步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技术发展的一种具象化表现方式，为重新配置城市空间和服务提供了机会，并对居民和城市物质要素产生深刻影响。在居住方面，爱彼迎（Airbnb）等共享短租平台将闲置居住空间商品化，重塑了城市资源的物质性^[3]，也进一步提升了闲置空间的利用效率，并促使居住空间功能向商业空间功能转变。在交通方面，共享出行作为一种新的交通方式，包括汽车共享、电动滑板车共享、拼车等诸多形式，与传统的出租车出行相比，它可以减少居民的等待时间，特别是在传统出租车和公共交通服务较少的城市外围区域，可以满足城市居民的潜在出行需求^[25]，并被证明可以减少私家车的的使用，降低对停车空间的需求^[26-27]。在办公方面，通过线上会议平台等，远程办公人员可以在家、联合办公空间、咖啡店等场所实现远程办公^[28]，并可能减少居民的出行需求，缓解交通基础设施压力，有助于降低交通出行造成的空气污染^[29]。而在游憩方面，线上购物平台以及按需、即时平台的快速发展影响居民的购物休闲方式，诸如网购平台、外卖平台等提供了居民获取食物、杂货等不同商品的线上方式，扩大了居民获取服务的范围，居民无须前往特定的商业空间即可获取相应服务，已逐渐成为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重要方式^[30]。

但是，平台城市主义对城市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需引起注意。在居住方面，虽然共享短租平台能够提高居住空间的利用效率，但由于共享短租的供应高度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可能会对社区中的居民日常生活造成极大干扰——社区内的居民家庭被游客取代，社区中的商业结构发生改变^[3]，超出地区承载力的游客数量或可致使城市设施被超负荷使用，并且住房可购买性降低、租金价格上涨，间接影响本地居民的住房可负担能力^[31]。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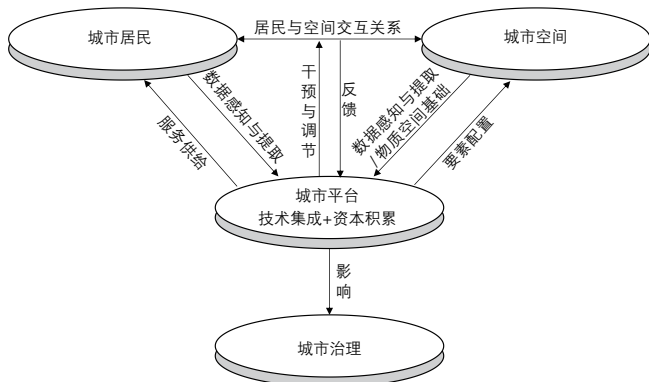


图1 平台城市主义概念图

通方面，虽然网约车平台为居民出行提供了新的选择，但可能会导致更多汽车出行，加剧城市拥堵问题^[32-33]，增加能源消耗^[34]。对于办公而言，虽然远程办公平台会帮助居民减少通勤距离，但也可能鼓励使用远程办公的居民产生更多非工作出行，并且可能会使居民搬迁到更偏远的区域，最终导致额外出行总里程的增加^[27]。从游憩方面看，外卖服务等按需平台可能会导致城市商业服务公平性问题的产生，主要因为此类平台多分布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城市化区域^[35]。已有研究发现，新冠疫情期间，居住在城市外围的居民难以获得外卖服务而被边缘化^[36]。此外，外卖配送员作为外卖平台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群体，其送货过程中的城市交通隐患以及可能产生的碳排放增加问题也引起了学者关注^[37]。

总体来看，平台发展得益于城市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数字化和个性化，并作为一种理想的商业模式出现^[14]。而平台城市主义作为一场以平台的作用和影响为核心的城市运动，与城市的关系是双向的^[7]。也即平台的发展需要依托城市空间，诸如城市的人口、空间接近度和基础设施等要素为各类平台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机会，而平台则通过对城市要素的重新协调与再配置构建了居民与城市各要素之间的联系网络，实现了居民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并对城市空间与居民产生了不同影响（图2）。

1.2.2 平台城市主义的特征

尽管不同学者对于平台城市主义概念的定义存在分歧，但从不同城市的实践经验来看，平台城市主义在参与城市经济、社会、政治等不同方面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数据为核心、依托城市空间以及以市场或消费者需求为导向这三大特征。

（1）以数据为核心资源

平台城市主义将数据作为城市发展和管理的要素，通过将数据集成到特定服务的平台，进而对城市产生影响。相较于智慧城市设施被动地采集信息，平台城市主义可以更直接地与平台用户建立联系并进行互动^[6]。依托于平台企业、服务供给方、用户，通过引入各种数字接口，平台积累了大量的城市运行数据，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可通过特定算法分析匹配最佳城市资源与用户，并提供对应的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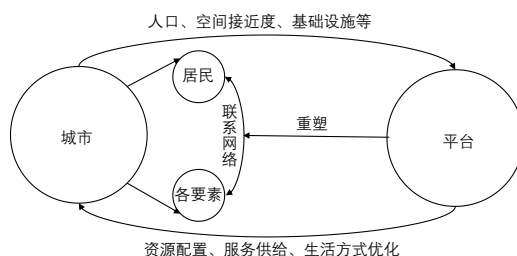


图2 城市与平台的双向关系

(2) 依托城市空间

虽然平台城市主义具有的技术跨空间特征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城市空间要素对其的影响^[14]，但城市特定的建成环境使得平台建设和发展成为可能^[7]，平台的商业模式依赖于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和高密度人口等要素^[1,7]，平台的运行需要相应的城市空间要素支撑。例如：电商平台的发展需要依赖城市的仓储设施，而各类商品或当日服务的配送则与城市的交通系统、高密度人口和商业设施等要素密切相关；共享出行平台依赖于城市交通系统，需要合适的道路和停车空间的规划与管理来支持共享出行的实现。

(3) 以市场或消费者需求为导向

平台运营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类服务，因此居民的需求是平台设计和建设的关键。与智慧城市不同的是，平台城市主义实现了对实践、流程和技术的重新配置，将服务的数字平台扩展到了城市政府之外的每一个消费者个体终端，深入城市居民“口袋”中^[14]。平台作为一种融合资本、技术和城市服务的结果，往往更直接地与消费者联系，并实现快速发展^[7]。换言之，平台需要借由消费者对日常平台服务的使用来优化和调整其设计，以满足自身进化的需求——消费者是平台最佳的数据来源^[10]。

2 平台城市主义对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其相应的思考

技术革命是推动我国城市现代化、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力量^[38]，技术进步和发展也使我们面临新的规划奇点^[39]。在平台城市主义背景下，一方面，随着技术变革被空间化，各类平台被嵌入城市空间，技术产品及其影响下的空间要素出现了新的组织逻辑^[40]，在影响城市空间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41]。另一方面，平台正在推动居民日常生活的重构。随着各类居民日常活动相关的服务被纳入平台，各类与城市服务相关的平台得以更加直接地与居民不同需求联系^[7]，并快速渗透和影响居民的日常活动，而居民本身也成为平台不断优化发展的数据源。因此，平台城市主义本质上是“居民—技术—空间”三者的交互关系，对平台这一技术具象化的分析需要我们把握“技术—空间”“技术—居民”之间的复杂关系与规律^[42]。同时，由于平台介于城市数据、资本和监管实践等之间，也将影响着中国城市治理的方式^[1]。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过去30年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迅速，同时政府也推行了许多诸如智慧城市的数字化战略与城市项目，在工业化、信息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量投入，这为各类技术平台的萌芽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土壤，与交通服务、餐饮服务等相关的平台均拥有较高的用户规模和使用率。因此，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快

速发展的平台浪潮，有必要在平台城市主义的背景下思考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

2.1 城市空间

平台正在冲击和影响城市的实体空间功能。首先，平台城市主义使得传统实体空间功能发生转变。例如各类共享短租平台正冲击着城市中原有的居住和商业空间，但其并未创造新的实体功能空间，而是将原有的居住空间转变为商业空间^[43]。其次，平台冲击传统城市空间并可能导致其衰败。平台城市主义的发展使得居民线上活动开展更加方便，这可能会减少居民对实体商店或相关服务设施的使用，因此诸如电影院、唱片店、书店等空间功能将会减少甚至消失^[27]。最后，平台可能使传统城市空间向用地功能复合化方向转变，例如：提供餐饮、休闲、医疗等服务的外卖配送平台可能导致传统的实体商业空间布局和经营模式发生变化^[44,45]；仓储与展示功能也在传统商业功能上延伸出来^[46]。

平台城市主义下，用地布局与空间组织也在发生变化。一项针对南京市外卖餐厅空间布局的分析发现，外卖餐厅的布局减少了对空间位置的依赖，在空间组织上呈现多中心的分散布局模式，空间集聚度相较于传统实体餐饮店铺更低^[47]。另外一项针对新零售业态的分析发现，依托线上线下渠道的新零售相较商业中心更喜欢布局在商务办公区，与传统零售的单中心集聚不同的是，新零售在不同城市圈层布局更均质^[48]。

平台发展也在助力实体空间的虚拟增强。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居民进入实体空间受到限制，诸如二手房平台提供的居家虚拟看房服务、旅行平台提供的远程游览服务使得实体空间功能得以拓展^[49]。借由平台营造的虚拟空间延伸了实体空间的功能和范围，以虚拟形式实现了场所的营建^[50]。

面对平台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我国未来城市的规划不应只考虑空间要素组织和功能布局，而应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具备及时响应和规划应对的能力。首先，需要理解和把握平台城市主义对城市空间的作用机理，加强对平台城市主义下城市空间要素组织与功能演变的模式总结和机制分析^[46]，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赋能的规划理论。其次，平台的发展使得相关产业开始重构，并影响城市的服务供给方式，传统的中心地理论等可能无法解释城市外卖店铺的空间分布格局^[51]，因此，城市用地选址与布局、空间组织等传统的规划方法将受到挑战。如何结合平台发展与演化的特征，从更大空间尺度考虑空间资源的配置，针对性地形成新的规划设计方法，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和讨论。最后，平台城市主义通过引入各种平台数字接口将居民与城市建

成环境联系起来,从而在两者之间建立新的互动关系^[52],并为重新解释城市问题和提供解决方案提供支持,对空间的影响更加多变^[53]。因此,规划中应该转变“就空间论空间”的思维,进一步探索如何借由平台强化城市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能力^[54],数字创新赋能城市实体空间的营建也有待更多讨论和分析^[50]。

2.2 城市居民

在平台城市主义影响下居民活动发生了变化。首先,平台影响着居民出行决策,居民可以借助平台更好地对活动进行时、空间安排^[2]。例如:居民可以通过酒店预订平台和共享出行平台提前安排好行程,并实现异地交通无缝接驳;而共享租车、共享单车等平台则满足了居民个性化出行需求,并可能导致居民的出行范式转变^[55]。其次,居民各种日常活动线上化成为新趋势。各类日常服务平台如外卖平台、教育平台、政务平台等的发展,为居民体验、开展和维持日常活动提供了新的便利服务,这些服务正在深刻影响着居民传统活动方式^[56],居民线上线下活动交互将更加复杂。

城市居民成为平台设计、应用与演化的实验对象。平台作为连接服务算法逻辑与居民行为活动特定问题的接口,通过感知和量化居民的各类活动解析居民与城市空间交互关系,实现平台算法的优化和升级。例如地图导航平台的出现使得居民不受制于专业且昂贵的地理信息软件,可以在城市中免费使用导航平台的服务,获取专业的路线、交通方式等的推荐选项,但居民也必须接受平台相关服务条款的约束和管理,并将其活动数据反馈给导航平台,居民因此成为平台不断优化和改进服务的最佳实验参与者与数据来源。

平台城市主义影响下的社会效应值得关注^[2]。首先,虽然平台城市主义是以数据为核心,结合新技术对城市资源进行整合,但是平台城市主义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不是单纯的数字化^[1],还会围绕居民日常活动产生各类本地化物质^[24],并催生新的职业群体。例如:短视频平台催生了许多视频剪辑博主;共享出行平台催生了共享出行司机;外卖服务平台则需要平台注册的专门外卖骑手配送才能完成最终的服务供给;等等。以上这些新的职业群体在时空间的利用上也有别于传统职业^[2]。其次,平台本身作为技术的具象化表现,可能由于城市居民自身的数字化素养和使用能力、城市的数字化发展差异等导致平台服务发展和应用鸿沟的产生。基于武汉案例的研究结果表明:居民使用电子设备的熟练程度越高,越能更好地使用各类线上服务;45岁以上群体的线上服务使用水平低于45岁以下群体;居住在新建社区中居民的线上服务使用水平明显高于传统社区的居民^[56]。

服务供需的平台化使得居民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平台获取服务,需要重视平台城市主义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影响。首先,平台为居民体验、开展和维持日常活动提供了新的便利服务,而城市居民也逐渐熟悉并依赖平台服务,居民的活动模式、移动性由此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对于规划人员而言,不仅需要把握平台作用下居民活动的新特征与新模式,更重要的是厘清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并在空间设计中予以方案应对,通过平台赋能来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次,如果没有参与平台功能设计与优化的居民,平台将无法通过技术媒介持续协调、组织、优化不同城市要素,并提供相关服务。居民对待平台优化和参与的态度以及居民权益保护值得进一步讨论^[5],也需要政府制定合理的监管措施保障居民权益。最后,需重视平台城市主义下产生的社会效应。平台城市主义下新兴职业的出现将会对城市空间组织、运转以及居民个体活动带来何种影响值得深入探索;平台发展造成的鸿沟也需要引起规划人员的重视和警惕,其可能会加剧社会分异,带来城市的公平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城市规划中与不同群体和组织对话,并通过与相应企业的合作,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数字化规划发展战略。

2.3 城市治理

平台城市主义正在冲击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平台对数据的支持使得各类城市治理服务的访问量增加^[1];同时,平台通过收集数据和设置算法,可以动态优化城市资源配置,这种数据驱动方式提高了城市治理的质量和效率。例如:地图导航平台会在城市交通高峰期为居民提供实时路况信息,并通过提供路线选择引导居民出行,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一些专门的治理类平台也在中国的城市中开展了实践应用,如在杭州应用的“城市云脑”(City Brain)以数据为中心,通过数据的融合与分析,可以服务于城市交通、应急管理、城市政务、健康等不同场景,并为城市不同部门的策略制定提供了一系列指导^[11]。

平台的发展为居民参与城市治理提供了新渠道。由于各类城市平台具备技术、用户和数据上的优势,居民在获取平台服务的同时也能通过平台提供的反馈途径有效参与城市治理,不仅能提升城市治理的公众参与水平,还能促使城市服务的供需双方共同参与城市服务的生产——一种开放式的城市治理框架逐渐形成^[57]。例如上海、成都等政务服务以及百度地图等数字平台通过开放API接口或举办相应竞赛,结合城市治理面临的相应问题,在共享平台数据和算力基础上,为企业、科研工作者乃至城市居民提供了参与设计与优化城市服务的接口,有效促进了城市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互动,提升了城市治理和公众参与的效率和深度。

就我国未来城市的治理而言,需要客观看待城市平台的作用。首先,平台作为连接政府、城市居民和各方利益的数字中介,政府应该鼓励并积极拥抱平台,通过与企业签约合作,借助平台实时数据获取、问题分析、高效信息交流、智能决策支持等能力,为决策制定提供量化分析的依据,形成科学精准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决策^[58],解决城市问题。其次,平台可以成为政府解决城市问题、履行社会功能的“代理人”。政府可以借由平台的便捷性、高效性和广泛性来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将城市服务集成到平台中,解决与居民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各类问题。再者,平台可以助力城市公众参与,利用城市平台在城市治理参与群体扩大、效率提升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推动城市平台数据和算力的开放共享,从供给侧实现城市治理的供需双向互动,为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提供新渠道。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平台是通过商业形式影响城市运行的,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服务垄断,损害城市服务供给效率和公平,并存在数据泄露、违规使用等涉及城市居民隐私的问题^[13],需要城市政府发挥监管责任,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规制。

3 结语

各类平台已经深刻嵌入城市空间中,向我们展示着技术影响城市空间组织和运行的能力,影响着我们理解、规划和建设未来城市的方式^[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数据驱动城市的到来^[3]。

平台作为技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作用已经渗透城市的发展、建设与运转中,并将会为城市的发展与规划带来更多连锁效应。我们需要批判地看待这场正在城市中进行运动。相较于西方国家平台建设和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在中国的城市规划背景下,应该善用平台技术和数字化手段来改善城市运营与管理,并满足居民不同方面的需求,反映技术服务于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的价值观。

平台城市主义的兴起与发展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城市规划的对象和规划方法。未来的城市规划将面临一个由物理、社会和数字空间共同构成的数字新时代^[59],人、技术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规划对象也需要考虑技术对城市空间和居民活动的影响。在规划分析与设计的方法上,也需要考虑如何将平台要素纳入规划实践。

对于平台而言,作为城市居民与不同类型城市服务间的高质量链接中介,居民与服务的互动能为平台创造更多商业价值,良好的互动也可以在数据收集与分析、促进城市居民参与、实现城市服务数字化与智能化方面发挥作用。这需要政府合理引导、鼓励和监管不同平台参与城市治理过程,并思考如何借助平台来加强城市决策的科学性,促进居民参与

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过程,提升城市服务质量,推动城市运行向着可持续的智能化方向发展。**UPI**

注:文中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参考文献

- [1] CAPROTTI F, LIU D. Emerging platform urbanism in China: reconfigurations of data, citizenship and materialitie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0, 151: 119690.
- [2] 孔宇,甄峰,张姗姗. 智能技术对城市居民活动影响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 2022, 42(3): 413-425.
- [3] SÖDERSTRÖM O, MERMET A C. When Airbnb sits in the control room: platform urbanism as actually existing smart urbanism in Reykjavik[J].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cities*, 2020(2): 1-7.
- [4] BARNS S. FCJ-214 Visions of urban informatics: from proximate futures to data-driven urbanism[J].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2017(29): 1-20.
- [5] VAN DER GRAAF S, Ballon P. Navigating platform urbanism[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9, 142: 364-372.
- [6] BARNS S. Negotiating the platform pivot: from participatory digital ecosystems to infra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J]. *Geography compass*, 2019, 13(9): 1-13.
- [7] SADOWSKI J. Cyberspace and cityscapes: on the emergence of platform urbanism[J]. *Urban geography*, 2020, 41(3): 448-452.
- [8] ZHEN F, WANG B, WEI Z.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city in China: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J]. *Urban studies*, 2015, 52(13): 2313-2329.
- [9] 甘惟. 国内外城市智能规划技术类型与特征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 33(3): 105-111. DOI: 10.22217/upi.2017.420.
- [10] CAPROTTI F, LIU D. Platform urbanism and the Chinese smart city: the co-production and territorialisation of Hangzhou City Brain[J]. *GeoJournal*, 2022, 87(3): 1559-1573.
- [11] CAPROTTI F, CHANG IC C, Joss S. Beyond the smart city: a typology of platform urbanism[J/OL]. *Urban transformations*, 2022-03-26[2022-10-25]. <https://urbantransformations.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42854-022-00033-9>.
- [12] LANGLEY P, LEYSHON A. Platform capitalism: the intermediation and capitalization of digital economic circulation[J]. *Finance and society*, 2017, 3(1): 11-31.
- [13] FERRERI M, SANYAL R. Platform economies and urban planning: Airbnb and regulated deregulation in London[J]. *Urban studies*, 2018, 55(15): 3353-3368.
- [14] LESZCZYNSKI A. Glitchy vignettes of platform urbanism[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20, 38(2): 189-208.
- [15] PLANTIN J C, LAGOZE C, EDWARDS P N, et al. 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 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J]. *New media and society*, 2018, 20(1): 293-310.
- [16] BARNS S. Platform urbanism: negotiating platform ecosystems in connected cities[M].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 [17] HARDAKER S. Platform economy: (dis-) embeddedness processes in urban spaces[J/OL]. *Urban transformations*, 2021-12-20[2022-10-25]. <https://urbantransformations.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42854-021-00029-x>.
- [18] BARNS S. Smart cities and urban data platforms: designing interfaces for smart governance[J].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8(12): 5-12.
- [19] NOWAK S. 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 effects: speculation and risk in Jakarta's platform econom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21, 55(2): 471-489.
- [20] WAGNER J R. Circulating value: convergences of datafication, financ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J/OL]. *Urban transformations*, 2021-

- 06-29[2022-10-25]. <https://urbantransformations.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42854-021-00022-4>.
- [21] BISSELL D. Affective platform urbanism: changing habits of digital on-demand consumption[J]. *Geoforum*, 2020, 115: 102-110.
- [22] SUTHERLAND W, JARRAHI M H. The sharing economy and digital platforms: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8, 43: 328-341.
- [23] KITCHIN R. The real-time city? big data and smart urbanism[J]. *GeoJournal*, 2014, 79(1): 1-14.
- [24] KWAK J, ZHANG Y, YU J. Legitimacy building and e-commerce platform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experience of Alibaba[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9, 139: 115-124.
- [25] RAYLE L, DAI D, CHAN N, et al. Just a better taxi? a survey-based comparison of taxis, transit, and ridesourcing services in San Francisco[J]. *Transport policy*, 2016(45): 168-178.
- [26] KENT J L, DOWLING R. "Over 1000 Cars and No Garage": how urban planning supports car(park) sharing[J]. *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 2016, 34(3): 256-268.
- [27] MOURATIDIS K, PETERS S, VAN WEE B.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 sharing economy, and teleactivities: implications for built environment and travel[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2021, 92: 102716.
- [28] MARINO M D, LILIUS J, LAPINTIE K. New forms of multi-local working: identifying multi-locality in planning as well as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strategies in the Helsinki region[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8, 26(10): 2015-2035.
- [29] PÉREZ M P, SÁNCHEZ A M, DE L C M P, et al.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eleworking: a model of urban analysis and a case study[J].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4, 15(6): 656-671.
- [30] SHEN H, NAMDARPOUR F, LIN J. Investigation of online grocery shopping and delivery preference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COVID-19[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2022, 14: 100580.
- [31] NIEUWLAND S, VAN M R. Regulating Airbnb: how cities deal with perceived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short-term rental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20, 23(7): 811-825.
- [32] ERHARDT G D, ROY S, COOPER D, et al. Do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ies decrease or increase congestion?[J]. *Science advances*, 2019, 5(5): eaau2670.
- [33] BROWN A E. Who and where rideshares? rideshare travel and use in Los Angeles[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2020, 136: 120-134.
- [34] TIRACHINI A. Ride-hailing, travel behaviour and sustainable mobilit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J]. *Transportation*, 2020, 47(4): 2011-2047.
- [35] KEEBLE M, ADAMS J, BISHOP T R P, et al.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food outlet access through an online food delivery service in England: a cross-sectional descriptive analysis[J]. *Applied geography*, 2021, 133: 102498.
- [36] SANCHEZ-DIAZ I, Altuntas V C, Halldórsson Á. Assessing the inequalities in access to online delivery services and the way COVID-19 pandemic affects marginalization[J]. *Transport policy*, 2021, 109: 24-36.
- [37] KIM W, WANG X. To be online or in-store: analysis of retail, grocery, and food shopping in New York City[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c: emerging technologies*, 2021(126): 103052.
- [38] 汪光焘, 李芬, 高楠楠. 信息化对城市现代化的预期影响[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3): 15-23.
- [39] 刘泉. 奇点临近与智慧城市对现代主义规划的挑战[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5): 42-50.
- [40] 刘泉, 钱征寒, 黄丁芳, 等. 技术驱动下智慧城市空间产品的模块化组织逻辑[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 37(4): 83-91. DOI: 10.19830/jupi.2020.201.
- [41] GRAHAM M. Regulate, replicate, and resist—the conjunctural geographies of platform urbanism[J]. *Urban geography*, 2020, 41(3): 453-457.
- [42] 甄峰, 孔宇. “人—技术—空间”一体的智慧城市规划框架[J]. *城市规划学刊*, 2021(6): 45-52.
- [43] 周恺, 和琳怡, 张一雯. 共享短租平台的概念发展、市场影响和空间交互关系研究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11): 1934-1943.
- [44] 晏龙旭. “均质化—再集聚”: 互联网影响下餐饮业空间布局新特征——基于上海内环开放数据的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7(4): 113-119.
- [45] XI G, CAO X, ZHEN F. The impacts of same day delivery online shopping on local store shopping in Nanjing, China[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2020, 136: 35-47.
- [46] 孔宇, 甄峰, 张姗姗. 智能技术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研究进展与思考[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6): 1068-1081.
- [47] TALAMINI G, Li W, Li X. From brick-and-mortar to location-less restaurant: the spatial fixing of on-demand food delivery platformization[J]. *Cities*, 2022, 128: 103820.
- [48] 汪凡, 林玥希, 汪明峰. 第三空间还是无限场景: 新零售的区位选择与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9): 1522-1531.
- [49] 李伟健, 龙瀛. 技术与城市: 泛智慧城市技术提升城市韧性[J]. *上海城市规划*, 2020(2): 64-71.
- [50] 张思嘉, 龙瀛. 空间干预、场所营造与数字创新: 颠覆性技术作用下的设计转变[J]. *规划师*, 2020, 36(21): 5-13.
- [51] 施响, 王士君, 浩飞龙, 等. 基于实体店比较的长春市外卖 O2O 餐饮业空间特征及成因[J]. *人文地理*, 2019, 34(2): 80-89.
- [52] HANAKATA N C, BIGNAMI F. Platform urbanization, its recent accel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on citizenship. the case of Singapore[J]. *Citizenship studies*, 2022, 27(2): 189-209.
- [53] ODENDAAL N. Splintering by Proxy: a reflection on the spatial impacts and distributed agency of platform urbanism[J].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22, 29(1): 21-27.
- [54] 吴志强, 何睿, 徐浩文, 等. 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迭代规律[J]. *城市规划*, 2021, 45(3): 9-14.
- [55] 晏龙旭, 任熙元, 王德, 等. 范式转换: 共享机动性及规划和治理响应[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4): 63-69.
- [56] 牛强, 朱玉蓉, 王盼, 等. 社区生活圈线上化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初探——以武汉市典型社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 28(5): 111-118.
- [57] BARNES S. Mine your data: open data, digital strategies and 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 by code[J]. *Urban geography*, 2016, 37(4): 554-571.
- [58] 杨天人, 金鹰, 方舟. 多源数据背景下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决策——城市系统模型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J]. *国际城市规划*, 2021, 36(2): 1-6. DOI: 10.19830/jupi.2022.418.
- [59] 吴志强. 国土空间规划的五個哲学问题[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6): 7-10.

(本文编辑: 顾春雪)